

◎作家近况

范稳：向大地学习的写作者

舒晋瑜



范稳简介：1962年11月生于四川，1985年毕业于西南大学中文系，现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以及反映抗战历史的《吾血吾土》《重庆之眼》。曾获第七、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欧洲、澳洲和美洲地区出版发行。

我以为在大学就立志当作家的范稳，当年在中文系一定是个风云人物，没想到他告诉我，大学时他只做两件事：一是踢球，二是写小说。只是一篇作品都没发表过，4年下来，退稿信堆了一纸箱。

大学毕业，如果范稳选择留在重庆，就笃定去当高校老师；另外有一个机会是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报到。“我听说干地质的人四海为家，踏遍青山人未老。这符合我的兴趣。于是就来云南了。”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明确了要在大地上行走，在书房里写作。

在西藏他找到了自己的“延安”

在写西藏题材的作品之前，范稳什么都写，像个没有自己根据地的游击战士。西藏，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延安”。

“转变来自于1999年去了西藏，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仿佛在西藏找到了生命的激情和灵感的触发点。就这样一写就十来年。”范稳不认为这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而是一种召唤，是一次拯救。幸运的是他服从了这种召唤，哪怕为此付出了很多。

“这让我想到了地质找矿。”范稳说，写作其实也和地质找矿相似，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的认识，你先到处跑，然后感觉某个地方有戏了，就扎下去，用各种手段去探究它所蕴藏的文化宝藏。在他看来，西藏及藏民族文化就是这样的一座文化富矿，在云南的各民族，都蕴藏着很丰富深厚的文化矿藏。关键是你如何去发掘它、学习它、表现它。

他的三部描写西藏的作品，《水乳大地》展现了多种宗教、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在一片神奇土地上的交融与砥砺，描写了信仰的坚韧与可贵，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悲悯大地》描写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历史，解析了西藏社会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社会环境和原因；而《大地雅歌》则书写了一段被信仰拯救的爱情和被爱情改变的命运，以及宗教间的对话可能。这三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人物、故事、情节、甚至写法都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反映我所熟悉的藏区那片土地上上百多年的历史风云。我努力向福克纳学习，试图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范稳说，《大地雅歌》和前两部相比，在风格和价值取向上大体是相同的，在艺术探索上，因笔墨更多集中到藏族基督徒上，他借用了《圣经》的一些篇章的标题形式。

“三部曲”的完成，对范稳而言，意味着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他相信每个严肃的作家都是有使命感的，他感到庆幸的是在自己创作生涯最黄金的年龄，完成了这一人生使命。同时，这10年的写作让他学习到了一种民

族文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也改变了范稳的写作姿态，使他从一个找不到根据地的作家，成为一个向大地学习的写作者。

范稳用他缓慢的生活方式和写作姿态，体验藏区的一切。他用一年多时间在藏地周游，再用一年多时间看书阅读，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每部书都要用三四年时间。藏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又涉及到几种宗教的交流碰撞，他不能轻易动笔。既怕亵渎了这片土地上的各路神灵，也有悖于他的写作态度。

他的每部作品都要经历多年的艰辛完成。“藏地三部曲”如此，2014年出版的《吾血吾土》和2018年出版的《重庆之眼》也是如此。

抗战不仅仅是简单的攻城掠地

抗战题材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在写《吾血吾土》时，他最初的定位是“交代体”，交代一段历史，还原一段历史，而不是老实地一下子把历史的问题交代清楚。尤其有的老兵来自西南联大，受过中美军校的训练，并非一采访他就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倒出来。

范稳的采访对象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采访的难度可想而知。主人翁赵广陵的原型现在还活在世上，当然在作品中范稳还糅进了其他老兵的人生命运。

“史料当然是需要作为作品基础的，比如西南联大史料，我阅读得比抗战史料还多，因为那些大师们的思想境界我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其最起码的境界。抗战这一块史料也下了很大功夫，《中华民国史》通读了一遍，远征军的史料能找到手的都通读了。写历史的小说肯定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作品和人物。我总是能在史料中找到创作的线索和灵感。我自认为是个有历史感的作家，这或许是我的一个特长吧。”范稳说，期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能再次唤起国人对峥嵘岁月的重新记忆。那些老兵曾经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流砥

柱，是国家的铁血男儿，是抵御外辱的这段大历史的践行者和书写者。他们经历了抗战的艰难，也见证了伟大的胜利，他们的光荣一度被遮蔽和遗忘了。面对这些经历丰富的耄耋老人，范稳仿佛走近了一部国家民族的苦难史和光荣史，也仿佛和遗忘在搏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吾血吾土》是“书剑相逢”。的确，范稳笔下来自西南联大的抗战老兵，和同类题材相比，有着不一样的气息。范稳写出了一种文化的坚韧和坚守。抗战不止是军事上的坚守。范稳把联大学子作为主角，原因有两个，一是写青年学生热血报国，二是写文化的传承。范稳欣赏他们能够“上马杀贼，下马赋诗”。闻一多、朱自清是有气节的，他们受到传统教育，并且通过言行影响了学生，范稳写了大师们的弟子，他们的精神和大师一脉相承。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死扛，可能中国的文化是另外一副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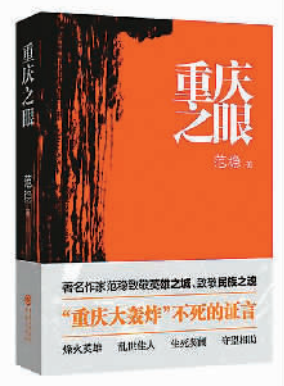
而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作品《重庆之眼》，范稳同样在史料上下足了功夫。他认为，一部对读者有吸引力的长篇应该有某些方面的难度，从思想内容、人物关系、语言、再到结构模式等，有抱负的作家总希望在文本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范稳自进人抗战题材的写作以来，一是专注于文化抗战，二是开始思考一些战后遗留问题。

“战争只要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但胜利以后怎么办，怎么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怎么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我们似乎想得不多。至少和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兴起的战后反思文学相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不愿就战争而写战争，就苦难而写苦难，历史既要客观现

实，还应现实有所教化、启迪、甚至警醒。在重庆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人们，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范稳说。范稳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最具体真实的存在。历史并没有走远，也没有被遗忘，在他们的回忆中，血与火的历史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鉴于此，范稳在构思时就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在今天所经历的战后索赔运动，与当年的抗战历史对比起来观照。两条线索的复述结构模式让他看到了一种对比的力量。尤其是在日本法庭罔顾历史、否认战争罪行的情况下，历史真实的再现便让一切狡辩和谎言都不攻自破了。

《吾血吾土》写的是云南的抗战历史，《重庆之眼》关注的是大后方重庆。《吾血吾土》中的文化因素偏重于西南联大，而《重庆之眼》中要表现当年左翼文化圈的一群大师以及重庆的戏剧文化运动等。离开重庆三十多年再回去重新寻找与发现，也有个再次接上地气的过程。当然对一个在藏区和云南的民族地区跑了多年的人来说，在重庆的采访和生活相对舒适、便捷得多，可这并不是抵消写作的难度。尤其是针对同类的题材，一个作家总是梦想着突破和超越自己，因此，挑战永远都存在。

《重庆之眼》体现了民族的自信和不服输，令人振奋。客观冷静的笔调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反思。小说在协助大轰炸受害者申诉的高藤博士、梅泽一郎等日本人友上也各有较多笔墨。“他们让我认识到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另一方面，让我看到了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范稳表示，尽管日本政府现在仍奉行“不赔偿，不谢罪，不鉴史”三不政策，但在民间，我们看到日本反战人士对日本当局的反对和发声。他们让我们看到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和今后的希望。他想起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或作家应该去化解敌意、建立起对话和沟通平台。他希望阅读此书的读者们能够不忘历史，反思战争，珍爱和平，还希望他们能够读到一部中国版“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



长篇小说 呈现井喷发展

杨 鸥

“2018年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不同凡响的一年，长篇小说呈现井喷状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日前在由《当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五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暨第二十届《当代》文学拉力赛颁奖典礼上说。

本届论坛评出的2018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作品分别是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石一枫《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徐怀中《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其中，李洱《应物兄》得票最高，即为2018年度最佳作品。

阎晶明指出，2018年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所呈现的风貌令人兴奋，小说的品质有了整体的提升，长篇小说既具有传统的根性，又具有与时代相吻合的现代性，具有艺术上融合自觉。很多的从前的先锋小说家，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创作，很多过去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见长的作家也开始把创作的主力用在了创作长篇小说上。比如《应物兄》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融合的作品，这是一个故事非常密集、非常漫长、人物也非常多、意象也非常分散的小说，但这是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有一种看不见的先锋意识和先锋色彩。

她用一颗慈悲的灵魂写作

——读柳营的《姐姐》

盛可以

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风格，一种是福楼拜主张的，排除主观抒情成分的“纯客观”艺术，在影响深远的《包法利夫人》中，其冷漠、无动于衷的“客观”，是现实小说最重要的艺术突破。另一类叙述者全情投入，与小说人物浑然一体，无法分割，一下揪住读者的心灵，浓烈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柳营的新作《姐姐》虽非第一人称叙事，但其内心投射出的情感与人物的紧密关系形成一种反省似的“客观”——姐姐是你，是我，是她，是瓶姨，是凤妹，姐姐是所有人的姐姐，她存在于社会任何一个地方。

叙事中有我无我，并无好坏高低之分，重要的是作者找到与内心琴瑟和弦的控调与声音，音调准了，氛围就有了，曲子就产生了感染力。从早期的长篇《阿布》，到新作《姐姐》，是从个人，到社会，从小我到大我的强大，语言气质一脉，变化的是叙述者内心更丰盈，视野更辽阔，更具社会性与反思色彩。

我们的父辈，多是那种暴力冷漠的父亲，重男轻女的暴君，也许他们将命运与生活中承受的窝囊之气撒在女儿身上，也许觉得天赋男权，父辈笼罩

的阴影造就女性敏感脆弱的心灵，同时也塑造女性坚韧刚强的性格。当那个小女孩成为作家，童年的一切恐惧与压抑也转变成财富，形成其独有的作家特质。《姐姐》中的父亲，总是在建造房子，在他的眼里，唯有房子可以帮助人获得存在的永恒感，对于真正的生命，却无体恤与爱，这使他建造房屋的行为充满了荒诞感。

长大后的姐姐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自己不死，这长在心尖儿上的劲头，一直都要在。”这股劲头，就是女性的独立与自强，就是察觉到女性性别不公与不平等境遇中的清醒意识，与周围那些以投河、服毒等以不同方式表达绝望的女性相比，她争得了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反过来对家族肩负起比男性更多的责任与重担。但她心中仍然埋藏着小时候的恐惧，虽然与父亲在岁月中达成和解，这种和解是亲情的本能。

姐姐这一角色的坚韧性格，同时隐含了作者对女性的期待。姐姐应该是你，是我，是她。姐姐，是所有人的姐姐，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命运交响曲。

我跟柳营是同龄人，我们周围的

一切非常相似，一根绳子从南到北将女人捆得紧紧的，一个人的遭遇，就是所有人的遭遇。有些事情到处都在发生，重男轻女的观念，城乡差别的歧视，性别的压抑，自强的奋斗……我相信很多人了解那些没有光明的夜晚，记得那些卑微的女性，然后逐渐遗忘。柳营把这些从个人的记忆中梳理出来。人到中年，我深刻记忆柳营的写作，她必然会将来投向向了制度下的女性命运，关于子宫，关于婚姻，关于无助，关于像“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冷漠。

柳营并不想摆脱与生俱来的水乡特质，反倒将那些湖中荡桨的声音清晰地传达出来。夜里的湖水倒映着幽幽天光，仿佛坐在张岱笔下的夜航船中，闲适时给你讲起了“姐姐”。冷雨敲窗，氤氲忧伤。不咆哮，不控诉，细腻、隐忍，克制，设身处地，充满对生命的悲悯之情。她的语言节奏富有美感与意蕴，像雨点击打油纸伞，伞下的命运寂寂无声，她们依赖于作家的挖掘与传递。柳营热爱人世间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她用一颗慈悲的灵魂写作，写下女人的命运，也写下女人的自强坚韧。

◎访谈

作为知名文学杂志《芳草》举办的逢双月出版的综合性期刊，《芳草》（潮版）创办于2011年3月，是全国首份且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农民工文学刊物。创刊8年来，美丽乡村、新创业史、作家手记、农民工诗会等颇具特色的栏目，不仅成为展现中国农民工时代风采的一个个平台，还助推一批又一批农民企业家、农民文学家的成长。



问：2018年第六期《芳草》（潮版）为什么会做《中国农民工四十年》专题？

刘醒龙：这缘于我们在办刊物过程中，对农民工、农村和农业话题的长期关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农民工群体没有特别强势的领军人物，但恰恰是这个群体，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进程的推动、贡献，极其了不得。某种程度上，没有农民工这个群体，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就以武汉这个城市为例，没有农民工，就没有武汉的今天。任何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是如此，发展得越快的地方，越是农民工贡献巨大的地方。

问：这期杂志选取了40年40个典型人物，选择标准是什么？

刘醒龙：我们首先选择那些具有时代和群体代表性的农民工，毕竟是40年的历史跨度，这个群体很庞大，我们无法求全，能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个记录就已经很好了。这些人也许不会成为经典，但一定会成为历史进步中的典型。

问：2011年创办《芳草》（潮版）时，为何会选择以农民工为主要关注人群？“潮”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刘醒龙：当时就是希望有一份杂志成为专门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发声的平台，没想到很快就获得了市政府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起名“潮”，是因为农民工作为社会一分子，同样立于改革的大潮、时代的潮流之中。他们是没有发出呐喊的改革的排头兵，是从没有辉煌灿烂的弄潮儿。在一天天的生活大潮中，他们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干的活最脏最累，得到的回报最低最少。像这样走在时代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是以巨大的牺牲来体现巨大贡献。

“潮”也映照出农民工近些年的一些大事件，如农民工潮、返乡潮及都市创业“潮起潮落”的实景，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新潮、开创出来的美好憧憬。

问：农民工作为杂志的唯一主角，每期封面人物都由优秀农民工担当。这有什么文学方面的特别意义吗？

刘醒龙：这些封面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出生于罗田县三里畈镇黄土坳村的刘锦秀。身为家中老大，为了生个弟弟传宗接代，她嫁给巴到8岁，按当地政策，头胎是残疾，可以生二胎。父母连续超生，加剧了生活贫困。刘锦秀13岁就孤身到浙江一家缫丝厂打工，当过家政服务，摆过地摊，当过幼教，后来辞职开杂货店、创办物流公司，从打工妹成为小老板，并在城市里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2004年，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回乡创业，带领山区群众养殖黑山羊。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刘锦秀与全县175个村建立了帮扶关系，扶持他们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她也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创业标兵”等殊荣，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可谓一代农民工中国梦的缩影。但采访时最打动作家们的，是她埋藏于心底的愿望——把当年送走的妹妹们一个个找回来。像刘锦秀这样经历苦难受依旧阳光灿烂的女性会是未来中国文学的新的乡村典型人物。

问：《芳草》（潮版）创刊时的一大愿景是办成农民工的VIP杂志，打造成农民工的“思想之家”，8年来，这个目标达到了吗？

刘醒龙：首先，如果我们对农民工的定位还囿于惨兮兮和脏兮兮，用这种观点办杂志，肯定没有出路。社会上既然有那么多办给白领看的VIP杂志，农民工也应该有自己的VIP杂志。其次，它的读者不一定全是农民工，也可以是农民工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或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一批人。总之，和农民工有某种关联。一本杂志不能等同于一剂马上能治病救人的药方，但我相信文学艺术对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改变，终将起到让社会与时代从本质上向更美好和更幸福改变的作用。

《芳草》（潮版）也发表主要写乡村题材和打工题材的名家作品，如获鲁迅文学奖的诗人田禾的乡土诗，但50%以上的文学作品都由农民工原创。让以前少有机会在省级报刊露面的农民工文学得以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鼓励他们从记录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由此走上文学道路。一些普通农民工在这里成长为一名作家。

通过我个人与农民工的接触，我感觉这个群体的变化很大，他们中很多人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气质、谈吐，甚至是收入，早已经融入城市。他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他们与雇主、城里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和了。《芳草·潮》是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对农民工的生活多一份了解，多种视角。和他们相处，会更加了解社会的进步。

问：你认为文学如何才能做到记录时代、讴歌人民？

刘醒龙：在人民和时代面前，首先要理解通常所说的“大我”和“小我”。文学是个人情怀所致，但个人情怀和个人恩怨、个人得失有不堪之别的，一个有情怀的作家，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写作置于时代和人民之中。反之，对时代、对人民的不正确认识，可能导致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在这个时代，作家需要在不急不躁的品格下，奋发努力。要用只争朝夕、将一日当成六百年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使中国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故事，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才能不负时代与人民。

文学要紧紧依靠人民这座大山